

●郑伟章

《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》前言

清高宗乾隆年间,朝廷集中了天下名士纪昀、戴震、法式善、朱筠、翁方纲、程晋芳、周永年、邵晋涵等360人,前后花了20年左右的工夫,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,直接产物是《四库全书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(以下简称《总目》)。《全书》当时写成副本七部,分储南北七阁,今毁三、存三、残一。200年来,对《全书》及《总目》尽管毁誉不一,但它们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,而且必将继续保存和流传后世。

《全书》底本除各省采进本、内府藏本刊本、《永乐大典》本外,相当数量是由各地藏书家所献。编撰《总目》时,高宗发布上谕,命令将献书甚多的藏书家姓名“附载于各书提要末”,以便读者“知其书所自来”,亦“以彰各家珍弃资益之善。”我们今天翻开《总目》(中华书局铅印本,分上下册),无论正式著录部分还是附存部分,发现每书书名、卷数之下,均用小字注明各家藏本,如“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”、“浙江鲍士恭家藏本”、“两淮马裕家藏本”、“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”等。细考之,《总目》著录的这类献书人姓名恰九十。著录家藏本最多者为四家:浙江宁波范懋柱天一阁,470种;杭州鲍士恭,378种;两淮马裕,373种;杭州汪启淑,265种。百种以上者有:程晋芳、周厚堦、汪如藻、吴玉墀、汪汝璥、黄登贤、孙仰曾、纪昀等。百种以下而数目较大者有:励守谦、郑大节、英廉、王际华、

周永年、朱彝尊、张若淮、孔昭焕、陆锡熊等。

《全书》及《总目》问世后,200年来,研究它的人很多,可以说,已经形成了一门《四库全书》学。据统计,到目前为止,已出版专著近50种,发表文章、资料329篇。人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它。但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,《总目》中注明的这类献书人姓名比比皆是,几乎每页都有数条,对这些人却熟视无睹,无人问津。新近出版的《四库全书纂修研究》(黄爱平著),大量征引档案史料,方方面面大体都亦涉及,无疑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成果。但它同样对这个问题未加注意研究。笔者寻思,清代学者劳格、赵钺见唐代御史台碑上数百人题名,即一一加以考证撰传,成《大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》一书。《全书》及《总目》为千古流传之巨册,其学术影响之大,远在唐御史台碑之上,且献书人中不乏当时名人和著名藏书家,岂可无考?笔者在近年搜集史料的基础上,作为这方面的尝试,写成了《〈四库全书〉献书人丛考》。

90人中,约30人为最知名,史料易得,其余则鲜为人知,对他们的情况乃遍检史书,详加考索。为考知一人,笔者着实费过不少周折。如“刑部员外郎张道源家刻本”,初见“张道源”,不审为谁。查《清朝进士年里题名录》,注云:“张道源长洲康熙二十四年三甲六名”。查《苏州府志》无其人。再细细审读《总目》中提要,方知是书又为

“浮山张体乾所刻”。既为张体乾所刻，又注明“张道源家刻本”，则疑二人当为一家父子。于是，又考之《浮山县志》，始知张道源确系张体乾之子。张道源为浮山人，非长洲人，不知《题名录》缘何注出上述一行文字？抑为同姓同名者乎？所以，这本小册子是属考据之作。

撰写既竟，笔者自揣有如下一些功用。

第一，可补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。

90个献书人中，可称之为藏书家的有近30人。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有程晋芳、黄登贤、纪昀、李文藻、励守谦、孙仰曾、王昶、汪启淑、汪汝璥、吴玉墀、翁方纲、周厚堦、周永年、朱筠、朱彝尊等人的资料，但均极简略，有的仅为附笔，有的如励守谦、汪汝璥、周厚堦等人连字、号亦未列出。还有，该书中虽有其父、祖而无其子、孙，如有鲍廷博而无鲍士恭，有郑性而无郑大节，有蒋重光而无蒋曾莹，有汪森、汪文柏而无汪如藻，有孔继涵而无孔昭焕等。笔者对这些颇著名的藏书家，均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，写出了献书人的传略，且详其一家藏书始末。这是超出《藏书纪事诗》之上的。无论哪一个藏书家传略，均有新史料可增补叶著。每篇中，以献书人为主，与之有关的父子兄弟亦在各篇中附出，故实则为150人之传。

另，笔者在撰写《丛考》过程中，还发现了《藏书纪事诗》所未列的一些藏书家。如“翰林院孔目熊志契家藏本”条，熊志契之父熊赐履，字青岳，号素九，湖北孝感人，官至吏部尚书，授东阁大学士，康熙间卜筑于金陵城北青溪之莲花桥。其家有下学堂，藏书甲天下，多人所未见之书，多达10万卷有奇，有《下学堂书目》6册。章学诚《丙辰札记》曾记蒋宗海（字春农）为该目撰跋，并撮述该目之梗概。熊氏堪称为康熙间一大藏书家，而其子熊志契乾隆间呈馆之书仅一种，为熊赐履著《经义斋集》十八卷。

又如“编修吴寿昌家藏本”条，吴寿昌之父吴燠文，字璞存，浙江山阴人，其家“藏书十余万卷，建一楼储之”。“侍讲学士彭绍观家藏本”条，彭绍观之父彭启丰，字翰文，号芝庭，长洲人，官至兵部尚书，暮年乞养归，所居十泉街，家有园林之胜，拥书万卷，啸哦其间。等等。这些都是增补《藏书纪事诗》的宝贵资料。馆臣中，陆锡熊、王际华、英廉等人，《总目》著录其家藏本甚多，亦堪称藏书之家，也可补《藏书纪事诗》。

第二，可当馆臣传。《总目》著录的献书人中，有47人是四库馆馆臣。他们是正总裁官：于敏中、英廉、程景伊、蔡新、王际华；副总裁官：曹秀先、王杰、金简；总阅官：德保、倪承宽；总纂官：纪昀、陆锡熊、陆费墀；翰林院提调官：祝德麟、刘锡嘏、张焘、肖际韶；武英殿提调官：彭绍观、韦谦恒；总目协勘官：汪如藻、程晋芳、李潢、刘权之、梁上国、任大椿、张羲年；校勘《永乐大典》纂修兼分校官：刘权之、励守谦、庄承箴、吴寿昌、吴典、陈昌齐、邹炳泰、邵晋涵、周永年、戴震、祝瑩、郑际唐、翁方纲、朱筠；缮书处分校官：严福、闵惇大、卢遂、王汝嘉、张慎和、方维甸；翰林院收掌官：熊志契，等等，书中都一一为之撰写了传略。不但包括了像于敏中、蔡新、王际华、王杰、纪昀、陆锡熊、陆费墀、邵晋涵、周永年、戴震、翁方纲等四库馆馆臣的主要代表人物，对那些名不见经传、鲜为人知的，也都写出了传略。又，《总目》首附职官题名录中“副总裁官”一栏漏载了李友棠。李友棠，字荅伯，号西华，江西临川人，李绂之孙。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充四库馆副总裁，官至礼部侍郎。三十九年十月因办理《四库全书》未能悉心校勘，疵谬叠出，遭部察议处分。尤其是王锡侯《字贯》案发，王氏删改《康熙字典》，另刻是书，于序文、凡例中开列清圣祖、世宗之名，未能避讳，炼成文字狱，坐悖逆死。李友棠曾为是书题

诗冠于书首,也遭革职处分。题名录之所以不列入他,大概是因为他受到了文字狱的牵连之故吧?又翁方纲在馆中撰写提要多达996篇,收入《总目》854篇,他堪称是一位目录学家。而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史列传》以及墓志、行状等,连他入馆校书之事亦未提及,真乃怪事!章学诚之友张羲年被荐入馆为总目协勘官,参与《总目》专类提要的撰写,以教官秩满,当改派知县,羲年请求留馆窥中秘书,以卒其业。高宗如其请,俾充纂修,一时传为异数。章学诚撰《文史通义》成,质之羲年,羲年“甚知弃取”,可知其学问之渊深。章学诚在《庚辛之间亡友列传》中为他写传,并在为其父张见龙所撰写的墓志铭中有附笔。诸如此类。《丛考》于学术研究都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第三,为进一步深入研究《四库全书》史提供了新线索、新资料。通过撰写《丛考》,笔者发现有如下一些特点值得重视。

献书人中,仅三分之一为藏书家,二分之一为馆臣,三分之一为其他人员(因藏书家与馆臣中有重叠者)。藏书家中以江浙为多,除黄登贤、纪昀、孔昭焕、李文藻、励守谦、翁方纲、熊志契、周永年、朱筠而外,其余20多人均出自江浙。四大藏书家,其一在扬州,其三在浙江。江浙藏书家又多系皖籍商人,如鲍士恭、程晋芳、马裕、汪启淑、汪如璫、吴玉墀等人均是。

高宗在谕中明白晓示,仅在《总目》中注明进呈百种以上的藏书家姓名,可是《总目》著录实际并非如此,90人中,仅30人为藏书家,馆臣有46人,占一半强,这就难免有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之嫌。馆臣或其他人员中,所呈书见于《总目》者大多为一种、两种,而且多系先人著作。如:馆臣蔡新进书两种,有一种系其族父蔡世远的著作;馆臣方维甸所进三种书,均系其曾祖方登峰、祖方式济、父方观承的著述;馆臣倪承宽进书一种,系其父倪国琯之著作;馆臣

林澍蕃进书一种,系其先人林赞龙之著作;馆臣闵惇大所进一种,系其先人闵嗣同著作;馆臣彭绍观所进一种,系其父彭启丰之著作;馆臣吴寿昌所进三种,有一种系其父吴燠文之著作;馆臣熊志契进书一种,系其父熊赐履之著作;馆臣祝德麟进书二种,均先人著作。其他人员中亦有类似现象,如翰林院笔帖式都保进书一种,系其先人都四德著作;刑部员外郎顾葵进书一种,系其先人顾九思著作;给事中邵庾曾进书一种,系其先人邵宾著作;工部侍郎汪承霈进书一种,系其父汪由敦著作;通政司使张若淳进书二种,一为其祖父张英、一为其父张廷玉之著作。这些人也都是朝臣。

笔者还发现一有趣的事,馆臣中有人不直接进呈其父兄著作,转由他人进呈。如馆臣黄登贤,《总目》著录其父黄叔琳、其叔黄叔璥著作共13种,仅5种由登贤自己进呈,有8种由励守谦代进。登贤为藏书家,断不会不收藏其父、叔著作,恐为避嫌,乃转由励氏所进。又馆臣郑际唐刊行其兄郑际熙《浩波遗集》三卷,其进书6种无是书,而转由梁上国所进。又四库馆总纂官纪昀亦藏书家,《总目》著录其父纪容舒著作三种,《玉台新咏考异》十卷为陆锡熊所进呈,《杜律疏》八卷由刘权之进呈,仅《唐韵考》五卷由纪昀自己所进呈。纪昀是知名学者,又喜藏书,断不会不保存其父著作,两种由他人呈进,岂非避嫌?

几个特例:《总目》著录进呈家刊本仅三例,一为李文藻,一为李中简,一为张道源。父子同列名于《总目》者一例,为曹学闵、曹锡龄。兄弟同列于《总目》者一例,为张若淮、张若淳。署衔不同者三例,一李文藻,先署“广东潮阳县知县”,后署“桂林府同知”;一王昶,先署“大理寺卿”,后署“江西按察使”;一戈岱,署“编修”、“御史”、“监察御史”等。依照署衔不同,可以判断该篇提要撰写于何时。不注献书人姓

名而注其先人姓名者一例,藏书家多由其子孙献书,《总目》即著录其子孙姓名,如天一阁范氏为范懋柱,知不足斋鲍氏为鲍士恭,小玲珑馆马氏为马裕,振绮堂汪氏为汪汝璆,裘杼楼汪氏为汪如藻,二老阁郑氏为郑大节。惟朱彝尊曝书亭藏书由其孙朱稻孙所进,不著录朱稻孙,而为“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”。而其时朱彝尊已卒世近70年。《总目》如此著录,亦不可解。这些特例也可备研究《四库全书》史之掌故。

第四,可当各家书目。藏书家的书目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,因为它是研讨学术之津梁。《总目》著录30个藏书家中,著录书籍甚多者有近20家。有藏书目录流传今日者仅7家:范氏天一阁有多种书目流传;汪汝璆家有《振绮堂书录》10册、《藏书题识》5卷、《振绮堂书目》5册、《振绮堂简明书目》2册等流传;汪如藻家有《裘杼楼藏书目》1册。周厚堉有《来雨楼书目》2卷;周永年有《藉书园藏书目》2册;朱彝尊有《曝书亭书目》和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录》等;朱筠有《椒花吟舫书目》1册。其余10多家均无书目流传至今。鲍士恭、纪昀、孔昭焕、励守谦、汪启淑等家未编过目。程晋芳有《桂宦藏书目》、黄登贤家有《养素堂藏书目录》、李文藻有《所藏书目》3种、马裕家有《丛书楼书目》、孙仰曾有《寿松堂书目》、郑大节家有《二老阁书目》,均已散佚不传。

笔者在撰写《丛考》时,以中华书局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上、下两册为底本,把著录的各家藏书的页码辑录出来,附于文末,以便研究者检索。实际按页码把有关各家的书目或提要辑录下来,就是各家的一部书目或提要。这对那些无书目流传的藏书家来说,是研究他们历史的宝贵资料。即使是对那些有书目流传今日的,也不无用处,至少可作为研究各家进呈书籍的情况参考。孙仰

曾的后人孙峻就曾经把《总目》著录自家的藏书辑成目录。他在为丁丙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写的叙中说:“咸丰辛酉,寇烟再炽,寒家所藏图籍,尽付云烟。峻生也晚,不获睹当时珍秘,但闻诸家君所诏而已。同治癸酉,峻方六龄,家君得殿本《四库总目》,峻窃读之,见四部中每书之下载杭州孙某家藏本,触处皆是,因订小册,潜于灯下录之,不数月积成厚帙,置于案头。”他辑的仅是孙氏一家,本书所辑乃90家,这对文献学史、目录学史、藏书史的研究应该是有裨益的。中华书局《总目》每页分上、中、下三栏,注明页码时,在数字之后即分别标明上、中、下各栏,若上中下三栏均有,则省记,仅记页码。读者依页码寻检各家藏书极为方便。

第五,可当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注释用。《总目》中书名之下用小字注明为何家藏本,几乎页页均有。这些人情况如何?均难以尽知。笔者在撰写《丛考》时,以《总目》注明的原文为题,如:“浙江鲍士恭家藏本”、“编修查莹家藏本”、“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”、“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”、“两淮马裕家藏本”等,读完各篇,即对每个词条也就了解了。

笔者闻见不周,读书未遍,撰写这些《丛考》,谈何容易。书中仍有一些人,如查莹、顾葵、祝堃、汪承箴、闵惇大、邵庾曾、熊志契等,采集史料简略。又如蔡廷举、都保、江广达、卢遂、张慎和等人,史志无传,且乏其他资料可供检索,有待日后发现。诚望天下方家,有以赐教者。

郑伟章 196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,已发文数十篇,出版专著6种。现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《国际商报》副社长。通讯地址:北京方庄路芳星园3区14楼、邮编100078。

(来稿时间:1995-12-05。编发者:刘喜申。)